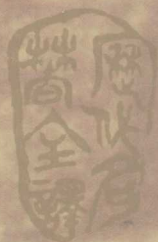


中國歷代名著全譯叢書

貴州人民出版社

礼记全译·孝经全译 [上]

吕友仁 吕咏梅 译注



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

吕友仁 吕咏梅

译注

礼记
孝经
全译

贵州人民出版社

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第二批 50 种）

王元化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二届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文心雕龙学会名誉会长，中国文艺理论学会会长，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

湖北江陵人，生于1920年11月30日。1946年任国立北平铁道管理学院讲师，1950年起任震旦大学、复旦大学兼职教授，新文艺出版社总编辑。1955年因胡风案件牵连受审查，工作中辍。

王元化自30年代后期开始写作，迄今已出版的专著有《抗战文艺论文集》（1939）、《文艺漫谈》（1945）、《向着真实》（1953）、《文心雕龙创作论》（1979年初版，1993年增补版，改名《文心雕龙讲疏》）、《文学风格论》（译文集，1983）、《文学沉思录》（1983）、《传统与反传统》（1990）、《思辩短简》（1990，1994再版增订改版为《思辩随笔》）、《清园夜读》（1993）、《清园论学集》（1994）。

王运熙 上海市金山县人。1926年生。1947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留任助教，现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兼任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曾任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第二、三、四届副会长，中国古代文论学会第三、四届副会长等。主要著作有《六朝乐府与民歌》、《乐府诗论丛》、《汉魏六朝唐代文学论丛》、《文心雕龙探索》、《中国古代文论管窥》、《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与杨明合著）等；主编的有《李白诗选》、《李白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三卷本）等。

李万寿（常务） 贵州清镇人。1942年3月生。现任贵州人民出版社社长，编审。著作有《晏子春秋全译》、《贞观政要译注》（合著）、《历代名著序跋选注》（合著）、《古文精华》（合著）、《茶花女》（缩写本），此外有历代文学名篇赏析十余篇，收入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代文学名篇欣赏》丛书。并用理宣、木子等笔名在省内外报刊发表各类文章数十篇。

袁行霈 江苏武进人，1936年4月生，195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

编委会 (以姓氏笔画为序)

中文系,留校任教,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暨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国学研究》主编等职。主要论著有《中国诗歌艺术研究》、《中国文学概论》、《中国诗学通论》(合著)、《中国文言小说书目》(合著)等。

程千帆 湖南宁乡人,1913年生。金陵大学文学士,曾在金陵大学、四川大学、武汉大学长期执教。现任南京大学一级教授,兼任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顾问、中华大典编纂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旅游文学研究会会长、江苏省文史研究馆馆长、南京市文联名誉主席。主要著作有《文论十笺》、《古诗考索》、《史通笺记》、《校雠广义》、《两宋文学史》等(后两种系与人合著)。

傅璇琮 浙江宁波人,1933年生。195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为北京中华书局总编辑,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秘书长,兼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1992年起任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长。主要著作有:《唐代诗人丛考》、《李德裕年谱》、《唐代科举与文学》、《河岳英灵集研究》、《唐诗论学丛稿》、《唐人选唐诗新编》、《黄庭坚与江西诗派研究资料汇编》、《杨万里范成大研究资料汇编》,主编《全宋诗》、《唐才子传校笺》。

李立朴(执行) 河北安平人,1954年5月生于西安。1986年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文学硕士。现任贵州人民出版社文史编辑室主任。副编审。著作有《许浑研究》、《唐才子传全译》以及论文十余篇。

黄涤明(执行) 湖南邵东人,1947年生于贵州平塘。1982年广西大学中文系研究生毕业。获文学硕士学位。中国训诂学会会员。副编审。出版著作有《搜神记全译》、《贞观政要译注》(合著)、《历代名著序跋选注》(合著)、《古文精华》(合著)等。

出版说明

本丛书是国家“八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50种)的后续项目。该丛书陆续问世以来,得到社会各界广大读者的欢迎和赞扬,荣获中宣部1993年度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入选作品奖,不仅在全国书市上被评为“最受读者欢迎的书”,而且在欧美汉学界十分流行,备受重视,对传播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加强中外文化交流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为满足中外读者要求《丛书》扩大规模、增加品种的强烈愿望,我们在50种书目的基础上,继续慎重选取四部名著50种(有个别数种合为一书)作为《丛书》的第二批书目以全注全译形式整理出版。在书目的取舍上,经部选取7种,从而将“十三经”全部出齐;史部的重点除《史记》外,决定选取我国古代科学家传记巨著《畴人传》,以广泛传播中华科技先驱的事迹;子部之书,除两汉外,补充了宋明理学名著,艺术类、宗教类名著和历代的一些著名笔记;集部则突出有爱国主义思想的文人别集,并增加了首批未上的一些著名选本,《书目》仍附于各书卷末。

本丛书(第二批50种)已被列入国家“九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我们将在全国学术界专家的鼎力支持下,加倍努力,把一套兼具权威性、通俗性、学术性、资料性的精品图书奉献给广大读者。

贵州人民出版社文史编辑室

1997年7月

总 目 录

礼记全译	(1)
孝经全译	(1163)

礼
记
全
译

吕友仁
吕咏梅
译注

目 录

前言	(7)
曲礼上第一	(17)
曲礼下第二	(68)
檀弓上第三	(99)
檀弓下第四	(185)
王制第五	(248)
月令第六	(294)
曾子问第七	(363)
文王世子第八	(402)
礼运第九	(424)
礼器第十	(449)
郊特牲第十一	(478)
内则第十二	(511)
玉藻第十三	(558)
明堂位第十四	(595)
丧服小记第十五	(609)
大传第十六	(633)
少仪第十七	(644)
学记第十八	(668)
乐记第十九	(683)

杂记上第二十	(729)
杂记下第二十一	(757)
丧大记第二十二	(790)
祭法第二十三	(824)
祭义第二十四	(834)
祭统第二十五	(863)
经解第二十六	(885)
哀公问第二十七	(892)
仲尼燕居第二十八	(902)
孔子闲居第二十九	(912)
坊记第三十	(919)
中庸第三十一	(941)
表記第三十二	(971)
缁衣第三十三	(995)
奔丧第三十四	(1013)
问丧第三十五	(1027)
服问第三十六	(1035)
间传第三十七	(1043)
三年问第三十八	(1051)
深衣第三十九	(1057)
投壶第四十	(1061)
儒行第四十一	(1071)
大学第四十二	(1084)
冠义第四十三	(1099)
昏义第四十四	(1103)
乡饮酒义第四十五	(1116)
射义第四十六	(1127)
燕义第四十七	(1137)

聘义第四十八	(1143)
丧服四制第四十九	(1151)
附录	(1159)

前言

一、关于《礼记》的书名

《礼记》一书之得名《礼记》，始于西汉。如《汉书·韦玄成传》云：“太仆王舜、中垒校尉刘歆议曰：《礼记·王制》及《春秋穀梁传》，天子七庙，诸侯五，大夫三，士二。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诸侯二昭二穆，与太祖之庙而五。’”

在西汉，《礼记》亦单称《礼》，或单称《记》。如《汉书·孔光传》云：“上于是召丞相翟方进、御史大夫光，皆引入禁中，议中山、定陶王谁宜为嗣者。方进、王根以为，定陶王帝弟之子。《礼》曰：‘昆弟之子犹子也。’定陶王宜为嗣。”又《通典》卷八十三引戴圣《石渠礼论》云：“闻人通汉问曰：‘《记》曰：君赴于他国之君，曰不禄；夫人，曰寡小君不禄。’皆不能明。”按《孔光传》所谓“《礼》曰”云云，见《礼记·檀弓上》；《石渠礼论》所谓“《记》曰”云云，见《礼记·杂记上》。

魏晋以后，《礼记》更有《小戴礼》之称。如《经典释文·序录》引晋司空长史陈邵《周礼论序》云：“戴德删古礼二百四篇为八十五篇，谓之《大戴礼》；戴圣删《大戴礼》为四十九篇，是谓《小戴礼》。”我在这里引证陈邵的话，其意仅仅在于指出魏晋时已有《小戴礼》之称，至于“戴圣删《大戴礼》为四十九篇，是谓《小戴礼》”的说法，今日学者已悉知其误，兹不具论。

麻烦在于,《礼》、《礼记》、《小戴礼》之名,在两汉时,并非为四十九篇之《礼记》一书所专用,十七篇《仪礼》,彼时也有《礼》、《礼记》、《小戴礼》之称。皮锡瑞《经学通论》云:“汉所谓《礼》,即今十七篇之《仪礼》,而汉不名《仪礼》。专主经言,则曰《礼经》;合记而言,则曰《礼记》。许慎、卢植所称《礼记》,皆即《仪礼》与篇中之记,非今四十九篇之《礼记》也。”分辨颇为明析。《后汉书·儒林传》中再三提到的《小戴礼》,是指戴圣所传的十七篇《仪礼》,也不是四十九篇的《礼记》。明白了这种二书共名的历史现象,我们就可以避免一些认识上的错误。之所以产生这种二书共名现象,从内因上讲,主要是由于《仪礼》和《礼记》二书的内容紧密相关。论其本源,《礼》、《礼记》、《小戴礼》之称,本属于十七篇之《仪礼》,后来渐次为四十九篇之《礼记》所夺。故黄以周《礼书通故》卷一云:“自魏晋号四十九篇为《礼记》,亦谓之《小戴礼》,而东汉十七篇之名《礼记》、名《小戴礼》者,又为四十九篇《戴记》所夺,于是别号之为《仪礼》。”

二、《礼记》四十九篇的编者与作者

就十七篇之《仪礼》与四十九篇之《礼记》而言,二者在两汉的地位甚不相侔。当时立于学官的《礼》,是十七篇之《仪礼》,不是四十九篇之《礼记》。在两汉时,《仪礼》是经,而《礼记》不是经,只不过是《仪礼》的附庸而已。今之所谓《礼记》者,“礼”,指《礼经》,即今之《仪礼》;“记”,犹如学习《礼经》时的笔记,它显然不是正式教材,只是附属于经文的参考资料,这种资料可以对经文进行某种解释、补充或归纳。

《礼记》四十九篇的编者,郑玄认为是西汉的经学家戴圣。他在《六艺论》中说:“戴德传《记》八十五篇,则《大戴礼》是也。戴圣传《记》四十九篇,则此《礼记》是也。”由于《汉书·艺文志》没有明确著录《礼记》四十九篇及其编者,郑玄的这个说法

便是最早最权威的了。现代学者洪业先生对此传统看法提出了质疑，认为今本《礼记》虽与戴圣不无瓜葛，但并非戴圣一人所编。而是在戴圣之后，郑玄之前，今礼之界限渐宽，家法之畛域渐灭，而《记》文之钞合渐多，不必为一手所辑，不必为一时之所成。详见其《礼记引得序》。其说颇有益于人们进一步思考，但尚不足以推翻传统旧说，盖证据犹不足也。

《礼记》四十九篇的作者，也是一个难以说清楚的问题。为《礼记》作注的郑玄没有把这个问题说清楚，为《礼记》作疏的孔颖达也没有把这个问题说清楚，后人就更不消说了。除了个别篇的作者可以指实以外，大多数篇的作者无法指实。孔颖达就老实地承认：“未能尽知所记之人也^①。”《汉书·艺文志》礼家所载的“《记》百三十一篇”，可以说是今本《礼记》的最主要的源头，说到这百三十一篇的作者，班固也只是注云：“七十子后学者所记也。”既然我们无法逐篇地指实作者，那么，笼统地说是“七十子后学者所记”恐怕还是可取的。“七十子后学者”这一概念所含的历史跨度甚大，可以说上起春秋，下迄西汉（如果采用洪业先生之说，则是下迄东汉），从亲聆孔子教诲的七十子之徒，到西汉的儒者，都包括在内。这里应该指出，《礼记》中有许多“孔子曰”、“子曰”、“子言之”一类的字眼，有的整篇都是“子曰”、“子言之”。孔颖达认为这都是孔子的话，其实并不尽然。对此，梁启超曾加以澄清：“各篇所记‘子曰’、‘子言之’，不必尽认为孔子之言。盖战国、秦汉间，孔子渐带有神话性，许多神秘的事情皆附之于孔子，立言者因每托孔子以自重。要之，《礼记》所说，悉认为儒家言则可，认为孔子言则需谨慎择也^②。”

① 《礼记正义》卷一。

② 《要籍解题及其读法》。

三、《礼记》的内容与《礼记》的地位的日益提高

《礼记》四十九篇的内容相当杂，据刘向《别录》的分类，或属制度，或属通论，或属明堂阴阳，或属丧服，或属世子法，或属祭祀，或属子法，或属乐记，或属吉事，共九类，每类的篇数也多寡不等。因其内容杂，所以被人们看作是一部儒家的礼学杂编。从今天来看，它是我们研究战国、秦汉时期儒家思想的宝贵资料。其中固然有糟粕，但也不乏精华。举例来说，其《礼运》篇中对于大同社会、小康社会的深情描述，《学记》篇中关于教学相长、尊师重教的阐述，并不因其年代久远而略有减色。还有不少章节，富于哲理，意味隽永。继承并进一步发掘《礼记》的积极成分，也是我们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项内容。

我们已经知道，西汉时的《礼记》只是《仪礼》的附庸，《仪礼》是经，立于学官，《礼记》则无此殊荣。但就其对西汉社会政治的影响来看，恐怕在当时《礼记》已经超过了《仪礼》，而西汉后期尤其如此。从《汉书》的记载来看，朝廷在讨论诸如祭祀、宗庙、立储等重大问题时，往往援引《礼记》为说。翻阅《汉书》，这样的例子很多。本文开头举了两个《汉书》的例子，由此可见一斑。王莽改制，其理论根据之一便是《礼记》，尤其是《礼记》的《王制》。即令稍事翻检《汉书·王莽传》，也不难看出此点。至于《礼记》对西汉学术思想的影响，我们从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桓宽的《盐铁论》、刘向的《说苑》和《列女传》中都不难找出痕迹。从以上事实中笔者得出这样一种观感，即在西汉时，《礼记》虽然无经之名，但已在很大程度上有了经的实。

东汉末年，郑玄为《礼记》四十九篇作注，这件事可以看作是《礼记》脱离《仪礼》而独立的开始。从此以后，《礼记》的地位日益上升，《仪礼》则日趋式微。曹魏时，《礼记》已立有博士。北朝时，“诸生尽通《小戴礼》。于《周礼》、《仪礼》兼通者，十

二三焉^①。”这说明当时的学者热衷于《礼记》之学，对《仪礼》、《周礼》已相当冷淡。到了唐代，《礼记》正式进入经的行列。此时，《礼记》一书，“人皆竞读”^②；而《仪礼》一书，“殆将废绝”。对于《仪礼》来说，真是每况愈下。到了北宋，王安石变法，干脆就废掉了《仪礼》。从此以后，作为经书的《仪礼》，可以说是徒有其名了。

《礼记》与《仪礼》这种戏剧性的变化，其原因何在？从古到今，学者无不认为《仪礼》难读。在西汉，连礼学专家徐襄也只能做到“善为颂，不能通经”^③。所谓“颂”，是指具体的礼节动作；所谓“经”，即指《仪礼》。唐代的韩愈在《读仪礼》一文中曾说：“余尝苦《仪礼》难读，又其行于今者盖寡。”清代的阮元在《仪礼注疏校勘记序》中也说：“《仪礼》最为难读。”我认为，《礼记》的由附庸变为大国，《仪礼》的由大国而日趋衰落，这种现象恐怕不能用《仪礼》比较难读来解释。如果说难读，“佶屈聱牙”的《尚书》在《十三经》中应该说是首屈一指，但其经典地位却始终岿然不动。我想，原因主要在于《礼记》与《仪礼》二书的内容不同，并因此而影响了人们的对其取舍。《仪礼》十七篇，篇篇都是一大堆繁琐的礼节单，篇与篇之间又多有雷同。《乐记》说：“陈尊俎，列筵豆，以升降为礼者，礼之末节也。”《仪礼》十七篇，除《丧服》一篇外，都是这种“礼之末节”。其枯燥无味自不必说了，更严重的是脱离时代，脱离生活。《仪礼》的内容极少具有可塑性，它近乎一堆僵硬的教条。“安上治民，莫善于礼”^④，随着社会的发展，《仪礼》的内容越来越不能满足封建统治者“安上治民”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统治者将其弃之如敝屣也就不足为

① 《北史·儒林传上》。

② 《经学历史》（中华书局本 210 页）。

③ 《汉书·儒林传》。

④ 《孝经·广要道章》。